

【文学与艺术研究】

读者与唐诗“孤篇”的经典化*

潘伟利

摘要:唐代许多“才秀人微”的诗人往往能凭借一首优秀作品而“竟为大家”,如王湾、崔颢、常建、张继,分别凭借《次北固山下》《黄鹤楼》《题破山寺后禅院》《枫桥夜泊》四首“孤篇”而在唐代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这主要得益于历代读者的发现与推崇。在唐诗“孤篇”的经典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读者有三类:一是首次遴选与评鉴的选者,他们发现了这些作品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价值,并将其收入唐诗选本推荐给同时代的读者,极大地影响了后世选本的收录;二是对作品大力推许或赋予无尽话题的名士,他们的推崇与不断赋值使这些诗作获得更多关注;三是刻诗于实地的精英及其引领下的无数大众,苏州寒山寺、镇江北固山、武汉黄鹤楼、常熟破山寺均有诗刻,更有不少因诗而得名的景点,当读者在这些景点一遍遍念诵该诗时,会再次确认与强化这些诗歌的经典性。每一位读者的认可都在为该诗的经典化添砖加瓦。

关键词:唐诗;读者;文学经典化;唐诗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0-0149-08

所谓“孤篇”并非“只有一篇”,而是“仅凭一篇”足以成为大家。清人王闿运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①。关于此诗,程千帆先生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②一文中已有详细论析。从中可看出一篇被冷落了几百年的作品如何被后世读者发现和理解,进而获得其不朽的艺术生命和文学史地位。

在中国诗歌史上,《春江花月夜》并非个案,《次北固山下》《黄鹤楼》《题破山寺后禅院》《枫桥夜泊》这些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都可视作“孤篇”,它们的作者王湾、崔颢、常建、张继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声名。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他们属于“才秀人微”的一列,不仅仕途偃蹇,除崔颢外,亦无人得入《新唐书·文艺传》《旧唐书·文苑传》。不过,根据王兆鹏《唐诗排行榜》对接受史的统计,这些作品分别位列第十一、第一、第八、第十二^③,得与李白、杜甫的诗歌并列。那么,它们的发现者是谁?哪些因素促使它们从数万首唐诗中脱颖而出,进而

一步步确立其经典唐诗的地位呢?

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象(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④尽管每一位读者都会有反响,但其作用却有大有小。在上述四首唐诗“孤篇”的历代“演奏”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读者有三类:一是首次遴选与评鉴的选者,二是对作品大力推许或赋予无尽话题的名士,三是刻诗于实地的精英及其引领下的无数大众。

一、选者与选本

现存唐人诗歌总量近六万首,哪些能够成为经典,作品本身的优秀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之变为现实的首先是选本的编选者。其贡献主要有三:其一,删汰繁芜,菁华毕出,选者通过其编选行为遴选出一部分他心中的优美诗篇,这本身就是一个披

收稿日期:2020-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48)。

作者简介:潘伟利,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234)。

沙拣金的过程;其二,保存、流传与推广作品,被选中的作品因为传抄与讽诵得以广泛流传,其他作品则渐渐散佚或湮没无闻;其三,影响后世选者与读者,一次基于个人喜好与观点的选评行为,因持续发挥影响,为作品的整个接受史定下基调。

以《枫桥夜泊》为例,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是现存最早收录张继《枫桥夜泊》的唐诗选本。这不仅使其在张继的众多作品中崭露头角,与戴叔伦、皇甫冉、刘长卿的优秀作品并列,而且影响了后世的中日唐诗选本。

《中兴间气集》共收录唐肃宗、唐代宗时期 26 位诗人的 140 余首诗歌,其中张继诗作 3 首,分别是《送邹判官往陈留》《夜宿松江》(即《枫桥夜泊》)和《感怀》,是目前所见“唐人选唐诗”十六种中最早收录《枫桥夜泊》的。可见,高仲武首次发现了该诗的独特价值。其评张继诗曰:“员外累代词伯,积袭弓裘,其于为文,不雕自饰。及尔登第,秀发当时。诗体清迥,有道者风。”^⑤高仲武通过《中兴间气集》的编选,为当时的读者筛选出了一部分他认为“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优秀作品,被选入的《枫桥夜泊》和该集一起流传,进入越来越多唐代读者的阅读视野。

《中兴间气集》的编选扩大了《枫桥夜泊》的传播范围,使更多读者阅读并喜欢上这首诗。这使得后世的唐诗选本往往亦将其收录。高建新、李树新曾对这一情况有过简单梳理,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清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宋代,收此诗者,除《文苑英华》外,还有北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南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和周弼《三体诗》。《唐百家诗选》成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共收唐代诗人 105 家,收张继诗 3 首,分别是《枫桥夜泊》《闾门即事》和《过春申君庙》。该书实为宋敏求与王安石共同编选,是一部文献整理性质的书。在二人同为三司判官期间,宋敏求对家藏唐人诗集进行了初次整理,王安石在此基础上加以选择。^⑥这些被整理的唐人诗集,即为其选诗的来源,其中包括《河岳英灵集》《篋中集》和《中兴间气集》。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称:“王荆公《百家诗选》,盖本于唐人《英灵》《间气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刘希夷、韦述之诗,无少增损,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数,储光羲后,方是荆公自去取。”^⑦该书在北宋末宣扬“王学”的背景下极为流行,至南宋时,“它虽退出了诗学中心层,但在精英文化之下的

初学者层面广为传承”^⑧,并一度作为书院教材。其影响力可想而知。《万首唐人绝句》成书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本为教稚儿诵读而编,后奏进宫中。由于事先没有周密的编纂计划,所以编次较为紊乱,重收、误收的现象也比较多。该书共收张继五七言诗歌 8 首,《枫桥夜泊》为其一。

元代杨士弘集十年之力而编选《唐音》,分“始音”“正音”“遗响”三部分,“正音”七绝部分收张继《枫桥夜泊》《闾门即事》,五绝部分附张继六言诗《奉寄皇甫冉》一首。在其所作《唐音序》中,还对包括《中兴间气集》在内的几部唐人选本稍加评论:“至如《中兴间气》《又玄》《才调》等集,虽皆唐人所选,然亦多主于晚唐矣。”不仅如此,他还称:“王介甫《百家选唐》,除高、岑、王、孟数家之外,亦皆晚唐人。”^⑨可见杨士弘不仅阅读过《中兴间气集》,还阅读了本于《中兴间气集》的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其受高仲武影响已毋庸置疑。

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成书于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共收包括《枫桥夜泊》在内的张继诗歌 11 首。该书还引用了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对张继的评论“员外累代词伯,积袭弓裘,其于为文,不雕自饰”^⑩,可见其受高仲武影响之深。此外,高棅还编选了《唐诗品汇》的“精编本”——《唐诗正声》,该书中张继诗歌仅选《枫桥夜泊》一首。稍后唐汝询的《唐诗解》,又一次在《唐诗品汇》基础上,“采掇《品汇》之英”,张继五七言诗,仅收《枫桥夜泊》。在二人看来,《枫桥夜泊》是张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清代王尧衢《古唐诗合解》,选诗“唯取格调平稳、词意悠长而又明白晓畅、皆人所时常诵习者”^⑪,亦仅收录张继《枫桥夜泊》一首。此外,还有影响较大的沈德潜《唐诗别裁》,收《枫桥夜泊》和《闾门即事》等三首。尤其是当时流传最广的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⑫,属“优中选优”,其中也仅收《枫桥夜泊》一首。在近五万首的《全唐诗》中,张继《枫桥夜泊》位居三百首之列,表明在经历了千年的淘汰与筛选之后,该诗仍然是历代公认的好诗。

此外,唐诗自奈良时代起就不断被遣唐使沿中日“海上丝绸之路”带回日本^⑬,目前可知,首先使《枫桥夜泊》在日本广为传诵的是南宋周弼所编《三体诗》。该书成书后不久便被传至日本,且在 14 世

纪时就已出现和刻本,而后不断重刻,并逐渐取代《文选》和《白氏文集》,成为镰仓、室町时代流行最广的唐诗选本。该书选收张继诗歌一首,即《枫桥夜泊》。《三体诗》是南宋后期较流行的唐诗启蒙读物,与《唐百家诗选》所选诗人、诗目相合的比例近60%,所以周弼应受到了《唐百家诗选》的影响。^⑭如此,从唐代高仲武到北宋王安石,再到南宋周弼的影响脉络已很清晰。

室町之后的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三体诗》逐渐为另一唐诗选本所取代,即一直争论未果的旧题明人李攀龙编《唐诗选》。该书亦仅收《枫桥夜泊》一首。继之而起的数十种《唐诗选》注解本与改编本,如户崎允明《笺注唐诗选》、服部南郭《〈唐诗选〉国字解》、岗野荣太郎的《唐诗选讲义》等,延续其收且仅收《枫桥夜泊》一首的范例,并“各显其能”详加注解,使得该诗和风靡一时的《唐诗选》一起走进了江户、明治日本的千家万户。即便是不以《唐诗选》为名的唐诗选本,亦难以摆脱其影响,如新井白蛾《唐诗儿训》与皆川淇园《唐诗通解》,均仅收录张继诗歌一首,即《枫桥夜泊》。

关于旧题李攀龙《唐诗选》,虽其编者尚有争议,但其本于《唐诗品汇》已成定论。对此,明人已有论述,胡震亨称:“详李选与《正声》皆从《品汇》中采出,亦云得其精华。”^⑮许学夷亦言:“尝与黄介子伯仲言于遴选唐诗似未睹诸家全集。介子伯仲曰:‘向观于麟《诗选》所录,不出《品汇》。……’予因而考之,信然。”^⑯

如此,继《中兴间气集》→《唐百家诗选》→《三体诗》之后,《枫桥夜泊》传至日本的第二条线路已很清晰:《中兴间气集》→《唐诗品汇》→《唐诗选》。

综上可知,自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第一次编选《枫桥夜泊》始,后世编选者在收录篇目上虽几经变化,但此诗一直是不变的经典诗篇,凡收张继诗者,定收该诗。其中既有受直接影响者,如宋敏求、王安石、杨士弘、高棅等,他们曾直接阅读与参考了《中兴间气集》;也有洪迈、沈德潜与蘅塘退士等受间接影响者,虽不能确定他们曾经阅读过《中兴间气集》,但该集的编选和流传使《枫桥夜泊》成为“人所时常诵习”之作,鉴于此,他们往往将其收录,这又进一步扩大了该诗的传播。如此,通过以高仲武为首的历代选者的不断收录,《枫桥夜泊》取得了其在唐诗选本领域的经典地位。

王湾《次北固山下》、崔颢《黄鹤楼》、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不过,这三首诗歌的最先编选者是高仲武更早的殷璠。殷璠《河岳英灵集》收常建诗15首,王湾诗8首,崔颢诗11首,均为三人所有作品的首次去取,三首“孤篇”无一漏网。殷璠还在评语中将《次北固山下》《题破山寺后禅院》中的联句单独捻出,大加赞赏。三人之中,他对常建推许最多,不仅将其诗置于全书之首,收诗数量与王维并居第二,仅比王昌龄少1首,且殷璠对常建的批评亦成为后世诸家批评之滥觞。^⑰殷璠之后,北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未收王湾诗)、南宋周弼《三体诗》、元杨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诗品汇》、明唐汝询《唐诗解》、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等历代重要选本亦先后收录此三人作品,或多或少,哪怕仅收一首,这三首诗亦是必收之作。而《河岳英灵集》对他们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不仅体现在选诗方面,还体现在品评方面。如高棅直接将殷璠的评语收入其《唐诗品汇》,这就更进一步影响了与之相关的《唐诗解》《唐诗选》。

当然,读者兼选者的殷璠在唐诗经典化过程中的贡献远不止此。李白诗歌之所以在盛唐就已开始成为经典,与《河岳英灵集》的收录也有极大关系。该集是现存三部盛唐诗歌选本(另两部为《搜玉小集》《国秀集》)中唯一收录李诗的,且有13首之多,不管是殷璠对李白及其诗文个性特征的揭示,还是对其代表作的遴选,都影响了后世整个接受史。^⑱

二、名士与诗话

选本的收录只是完成了诗篇经典化的第一步。《河岳英灵集》收盛唐诗234首,《中兴间气集》接着收肃宗、代宗时诗140余首。四首“孤篇”仅为众多好作品之一,若想在这些优秀作品之间的二次竞争中获胜,还需要其他读者的帮助。在这一过程中,对作品大力推许或赋予无尽话题的名士功莫大焉。

入宋以后,欧阳修成为改变《枫桥夜泊》命运的第二位重要读者。其《六一诗话》载: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⑲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评论无疑具有较大影响力。不仅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还激起了许多学者的讨论。从此,《枫桥夜泊》和“夜半钟声”一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首先接过这一话题的是约成书于北宋末的陈正敏《遁斋闲览》和王直方《兰台诗话》。南宋初年吴曾在其所著《能改斋漫录》卷三“辨误”部分称:

陈正敏《遁斋闲览》,记欧阳文忠诗话,讥唐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钟鸣时,疑诗人偶闻此耳。”且云:“渠尝过姑苏,宿一寺,夜半闻钟。因问寺僧,皆曰:‘分夜钟,曷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之。”以上皆《闲览》所载。予考唐诗,知欧公所讥,乃唐张继《枫桥夜泊》诗。……乃知张继诗不为误,欧公不察。而半夜钟亦不止于姑苏,如陈正敏说也。……王直方《兰台诗话》亦尝辩论,第所引与予不同。^{②0}

从中可知,在吴曾之前就已有宋人陈正敏、王直方等人对欧阳修的观点表示反对,此时吴曾又通过“考唐诗”的方式支持陈正敏之说。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予考唐诗,知欧公所讥,乃唐张继《枫桥夜泊》诗”一句,看来吴曾是获悉“夜半钟声”的讨论在前,而后才顺藤摸瓜知道《枫桥夜泊》。换言之,“夜半钟声”的话题带动了读者对《枫桥夜泊》的阅读。

之后,不断有人加入此话题的讨论。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计有功《唐诗纪事》编成,该书于《枫桥夜泊》之后小字注曰:“此地有夜半钟,谓之无常钟,继志其异耳。欧阳以为语病,非也。”^{②1}南宋孝宗淳熙年间,陈岩肖在其《庚溪诗话》中又提及这一话题,并将矛头直指欧阳修《六一诗话》:“姑苏枫桥寺,唐张继留诗曰:……六一居士《诗话》谓‘句则佳矣,奈半夜非鸣钟时。’然余昔官姑苏,每三鼓尽四鼓初,即诸寺钟皆鸣,想自唐时已然也。”^{②2}南宋中期《老学庵笔记》中亦有讨论:

张继《枫桥夜泊》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公嘲之云:“句则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钟时。”后人又谓惟苏州有半夜钟,皆非也。按于邺《褒中即事》诗云:“远钟来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会稽严维宅》诗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此岂亦苏州诗耶?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京都

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②3}

另据高建新介绍,宋代彭乘《续墨客挥犀》与明代张睿父《琅邪代醉编》也都持这一观点。^{②4}

至明代,胡应麟重在从具体的体格声调入手,进而把握唐诗的兴象风神^{②5},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其《诗薮》言:“又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②6}晚明许学夷的《诗源辩体》和清代黄生的《唐诗摘钞》也都沿着这一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一历时数百年的讨论,在明代格调论唐诗学背景下,不再执着于具体事象的有无,而努力探寻“声调”“兴象”,探寻浑成无迹的艺术境界中所产生的情韵意味。^{②7}但对于《枫桥夜泊》而言,“激烈争论不仅激发了读者对《枫桥夜泊》更大的兴趣,事实上也有效地扩大了《枫桥夜泊》的名声”^{②8}。就这样,《枫桥夜泊》和“夜半钟声”的话题一起为大家耳熟能详。无论是为欣赏而阅读的一般读者,还是为研究而阅读的学者,都会去接触《枫桥夜泊》这首诗,从而使其获得了超出其他唐诗的关注。以上诸家不管反对与否,都以欧阳修的质疑为其立论的起点,显然受其影响。

《次北固山下》《黄鹤楼》《题破山寺后禅院》也都有一个与名士相关的话题。《次北固山下》的最早发现者是张说,他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②9}。张说前后三度为相,执文柄三十年,既是政坛领袖,也是文坛领袖。他的这一行为既赋予该诗新旧交替的政治寓意,又将此诗树为盛唐诗风标杆,引领文学潮流。^{③0}殷璠首记此事于《河岳英灵集》,而后许多选本与诗话亦往往论及此事,如《全唐诗话》《唐诗纪事》《带经堂诗话》《说诗碎语》《石洲诗话》等。

《黄鹤楼》的最早推崇者是李白,《苕溪渔隐丛话》引《该闻录》:“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家山何处?烟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③1}此后《唐诗纪事》《后村诗话》《升庵诗话》《归田诗话》《艺苑卮言》等都论及此事。如此,不关真实与否,《黄鹤楼》一诗便因李白的赞许与拟作而增添了新

的光辉与话题^⑳,吸引了更多的读者。

《题破山寺后禅院》的另一位发现者也是欧阳修。他对该诗大加赞赏:“吾常喜诵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㉑欧阳修欲效而不得的感叹一下子提升了常诗“造意之工”,但这仅是其影响的开始,此后的文集与诗话中频频将欧阳修之叹与常诗并引。如苏轼称:“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欧阳公最爱赏,以为不可及。”^㉒惠洪《冷斋夜话》:“唐诗有‘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句,欧阳文忠公爱之,每以语客曰……”^㉓此外,将之并引的还有《茗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容斋随笔》《西溪丛语》《全唐诗话》《唐诗纪事》《颐山诗话》《带经堂诗话》等^㉔。

无论是欧阳修对张继佳句的赞美及“夜半钟声”的质疑、对常建诗的褒扬,还是李白、张说的推崇,都使这四首诗在作为“好作品”的同时,又拥有一段与名士相关的佳话。这既可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可以使人们在选本之外,多了诗话这条新途径,从而再次成功晋级,并拥有了更多读者。

三、大众、诗境与实景

选者的收录与名士的认可,确为诗篇吸引了更多读者,但他们首先需要成为选本与诗话的读者,这于士人而言并非难事,但又不免将许多大众读者排除在外,终究无法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篇,且诗境虚拟,难以让人印象深刻。凑巧的是四首“孤篇”均与四处名胜密切相关,而大众读者又往往将虚构当真实^㉕,这样,读诗者则向往景,而观景者则始读或重温诗,在诗境与实景之间,一位位游人既为经典化所“裹挟”,又主动将诗篇进一步经典化。如此,便形成了一个由少数精英与无数大众共同组成的“读者金字塔”。

四首“孤篇”中,《枫桥夜泊》“读者金字塔”的建立过程最为清晰。从中既可看出一位读者是如何影响了其后的读者,也可看出风景名胜怎样为诗篇培养、维系读者。高仲武和欧阳修,使《枫桥夜泊》初露锋芒,但并没有将该诗与苏州寒山寺建立联系。北宋王珪将《枫桥夜泊》刻石立于寒山寺,第一次将诗与寺联系起来,将诗歌意象“寒山寺”与实景寒山寺联系起来,这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被许多苏州方志收录。此后,人们普遍默认张继诗中的“寒山寺”

就是现在的苏州寒山寺,直至今日。

今苏州寒山寺,约从明代开始才叫“寒山寺”,唐宋时期无此专名。唐诗中写到“寒山寺”的,除张继《枫桥夜泊》外,还有3首。其一是韦应物《寄恒璨》:“心绝去来缘,迹顺人间事。独寻秋草径,夜宿寒山寺。今日郡斋闲,思问楞伽字。”据陶敏、王友胜二位先生考证,该诗兴元元年(784)秋作于滁州。^㉖若“夜宿寒山寺”者为韦应物,断不可能是苏州寒山寺;若为释恒璨,亦与苏州寒山寺无关。对此,孙望先生有过明确论述:

按此诗之“寒山”,盖谓有寒意之山,“寺”即指西山寺(琅琊寺),“独寻秋草径,夜宿寒山寺”,属释子恒璨之事,乃应物想当然之词。然《古今图书集成》以此系苏州寒山寺,遂列此诗于《方輿汇编·职方典》第六百七十卷苏州府部之下,误矣。又闻人谈《古诗笺》亦选笺此诗,引《一统志》谓寒山寺在苏州府城西十里云,亦误。^㉗

另有刘言史《送僧归山》“夜行独自寒山寺”^㉘、方干《途中言事寄居远上人》“白云晓湿寒山寺”^㉙,其中“寒山寺”均非实指,仅仅是指“寺在寒山之中”“山中寺刹”^㉚。杨明和凌郁之二位学者已有论述,至于因诗僧寒山而得名的传说,没有任何唐宋史料可以支撑,不足征信。^㉛

宋代,仁宗嘉祐以前,今寒山寺称“妙利普明塔院”,嘉祐后称“普明禅院”,因其地处枫桥,也一直简称“枫桥寺”,无“寒山寺”之称。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孙覿在其《枫桥寺记》中称:“而枫桥寺者……按《吴郡图经》,实妙利普明塔院。……至嘉祐中,始改赐普明禅院。”^㉜所以,此后不管是元丰七年(1084)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还是南宋范成大《吴郡志》、祝穆《方輿胜览》一直称“普明禅院”,而不称“寒山寺”。元末明初,“寒山寺”始以专名出现。卢熊《苏州府志》卷四十三载:“寒山禅寺去城西十里,旧名普明禅院。在枫桥,人或称为枫桥寺。”^㉝杨明先生认为既然称寒山寺“旧名普明禅院”,说明“寒山寺”之称是后起的^㉞。可知,大约至此时,“寒山寺”才取代宋时的“普明禅院”,与“枫桥寺”一起成为该寺的专有名称。

因张继作诗时,今寒山寺尚无现名,所以其“寒山寺”应是指作为诗歌意象的“寒山中之寺”。将这一意象实景化的是北宋王珪(1019—1085),其人为

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嘉祐二年(1057)正月与欧阳修、梅尧臣等同知礼部贡举,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封郇国公,故称王郇公。王珪将张继诗刻碑一事,见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编成的《吴郡图经续记》:“普明禅院,在吴县西十里枫桥。……旧或误为‘封桥’,今丞相王郇公顷居吴门,亲笔张继一绝于石,而‘枫’字遂正。”^{④7}叶昌炽称此为“张继诗第一石也”^{④8}。王珪卒于元丰八年(1085),该书成书时,其人尚在,故称“今丞相王郇公”,且记事较为可信。王珪将此诗刻石的初衷当是缘于对该诗的喜爱,但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人物,他的这一行为,无疑向人们宣告了他认为张继所听到的“钟声”来自立碑的枫桥寺,也即枫桥寺成了诗中的“寒山寺”。

本已广泛流传的《枫桥夜泊》,经过王珪的“牵线”,人们逐渐认为位于苏州阊门外十里的普明禅院就是张继诗中的“寒山寺”。但此前该寺一直约定俗成地叫普明禅院,不会因为一块诗碑让所有人马上改口。所以在宋人的记载中,一边认为这就是张继诗中的寒山寺,一边又说这是普明禅院或枫桥寺。继续称普明禅院者,如前引《吴郡图经续记》:“普明禅院,在吴县西十里枫桥。‘枫桥’之名远矣,杜牧诗尝及之,张继有《晚泊》一绝。”^{④9}范成大的《吴郡志》亦于“普明禅院”下附注张继此诗。仍称枫桥寺者,南宋绍兴年间孙觌既以《枫桥寺记》为题,又称:“唐人张继、张祜尝即其处作诗记游,吟诵至今,而枫桥寺,亦遂知名于天下。”^{⑤0}《庚溪诗话》称:“姑苏枫桥寺,唐张继留诗曰……”^{⑤1}陆游《宿枫桥》亦称:“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⑤2}

至元代,这一状况得到改变,“寒山寺”终于取代“普明禅院”成为该寺的“学名”,枫桥寺则继续使用。所以元末明初的《苏州府志》称:“寒山禅寺去城十里,旧名普明禅院。在枫桥,人或称为枫桥寺。”明清以后,枫桥寺的名称也渐渐被人们遗忘。时至今日,“寒山寺”一名驰名中外,却很少有人记得它曾经被称为妙利普明塔院、普明禅院和枫桥寺。

王珪所构建的“诗寺”关系,想必也得到该寺僧人的大力宣传。此后,读过《枫桥夜泊》的人会向往寒山寺,慕名而来:“曾读《枫桥夜泊》诗,钟声入梦少年时。老来远访寒山寺,零落孤僧指断碑。”^{⑤3}来到寒山寺的人,也会更喜爱《枫桥夜泊》。如果说高仲武和欧阳修的贡献,使得那些能够阅读唐诗的人接触到这首诗,那么王珪此举,则使更多人可以读到

或听到这首诗。因为只要走进寒山寺,就可以看到《枫桥夜泊》的诗碑、听到人们的念诵。可以说,《枫桥夜泊》使寒山寺驰名,“天下有其名甚大,而其实平平无奇者。苏州寒山寺,以张继一诗脍炙人口,至日本人,尤妇孺皆知。”^{⑤4}与此同时,寒山寺也为《枫桥夜泊》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各阶层读者。

相比之下,崔颢诗与武汉黄鹤楼、常建诗与常熟破山寺、王湾诗与镇江北固山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与寒山寺一名后起不同,此三处景观在三人作诗前就已有一定名气。黄鹤楼位于水陆交通要道的长江黄鹤矶上,当江汉之交,一直是文人游宴题咏之地。崔颢题诗于黄鹤楼后,因诗歌本身“精妙绝伦”而又“通俗易诵”^{⑤5},加之崔颢本人也“名重当时”^{⑤6},所以该诗借助黄鹤楼在往来此处的人文之间快速流传。如果说在崔诗流传之前,是“诗借楼而名”的话,之后则是“楼借诗而名”。因为黄鹤楼的不可移动性,其影响仅限于周边及经过之人,诗歌则可通过读者的书写与吟咏广传于塞北江南。随着《河岳英灵集》等选本的不断收录和“李白搁笔”一说的加入,崔诗最终从众多黄鹤楼题诗中脱颖而出。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中的“破山寺”即今常熟兴福寺,除常诗外,还有吴融《送僧归破山寺》、皎然《秋晚宿破山寺》等。该寺建于梁代,命名与常诗无关。常诗带给该寺的变化是“空心潭”的命名与诗刻。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载:“唐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即此地也……有空心潭,因常建诗以立名。”^{⑤7}其后,两宋之际的吴可《藏海诗话》载:“苏州常熟县破头山有唐常建诗刻,乃是‘一径遇幽处’。……其诗近刻,时人常见之。”^{⑤8}如此,北宋时期名诗与名寺再度“联手”,寺内有诗刻与空心潭,寺外有唐诗选本的流传与欧阳修的推许,一位位读者一次次念诵此诗而逐渐忘记他篇,“高才而无贵仕”的常建凭此“孤篇”一步步确立了其在读者心中的位置。

镇江北固山在唐前就以三国故事扬名,又临近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四方客商往来不绝。王湾也是从洛阳沿运河南下之后慕名至此。虽然现在可知最早的诗刻约在明嘉靖年间勒石,但作为“天下第一江山”的存在,又有水陆交通的便利,北固山本身就吸引了唐代以降的无数游人,他们均是潜在的读者。尤其是到了“诗必盛唐”的明代,作为盛唐诗歌“楷式”的王湾诗,又进一步增添了读者对北固山的向

往,如王思任《游北固山记》称:“予每读王湾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辄为此山悲壮半晌。”^⑤当选本中的经典诗篇遇到眼前的大好河山,作为游人的读者再次确认了这首诗歌的经典性。“诗坛荣耀的决定权应属于那些不带偏见的普通读者”,作为经典的试金石,只有当这些诗篇在不同时代的他们那里唤起审美愉悦以后,才能最终获得其持久的经典地位。^⑥而实景在这一唤起过程中明显充当了极佳的媒介角色。

四、结语

俞陛云有言:“作者(张继)不过夜行纪事之诗,随手写来,得自然趣味。诗非不佳,然唐人七绝,佳作林立,独此诗流传日本,几妇稚皆习诵之,诗之传与不传,亦有幸有不幸耶?”^⑦《枫桥夜泊》之幸是遇到了三位知音,他们改变了《枫桥夜泊》的命运,王湾《次北固山下》、崔颢《黄鹤楼》、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亦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经典化历程。这些唐诗“孤篇”在经典化过程中表现出一些惊奇的相似性:

其一,作为“才秀人微”的诗人,其作品首先凭借自身的优美为当代选者所发现,将其收入唐诗选本推荐给同时代的读者,不管是对选本的直接摘编,还是选本所造就的名篇效果,都极大影响了后世选本的收录。这样的选者如殷璠与高仲武。

其二,诗国唐朝群星璀璨,佳篇间出,选本亦多,经典诗作还需名士的推崇才能获得更多关注。李白在《黄鹤楼》前搁笔,欧阳修对《题破山寺后禅院》“欲拟不能”的感叹与对《枫桥夜泊》“夜半钟声”的质疑,更有宰相张说在殷璠之前手题王湾诗于政事堂,这些故事既提升了作品本身的知名度,又成为诗话中绵延不绝的话题,其后的读者们不但接受了名士的褒扬,也多了诗话这一接触途径。选者与选者之间前后相继,学者与学者之间争相探讨,作为参与者,他们又吸引与影响了一批旁观者,在阅读与讨论的彼此渗透之中,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中上层读者群。他们的推崇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往往又成为大众读者接受的风向标。^⑧

其三,北固山旁商贾辐辏,黄鹤楼下四通八达,破山寺、寒山寺香火不绝,或有碑刻长廊,或有空心潭影,它们无不向古今游人诉说着诗与景的故事。作为选本、诗话之外的第三条途径,它不问贤愚,无论长幼,使人慕之而来,来而不忘。虽未必人人都如

王珪贡献之大,但每一位读者的认可都在为该诗的经典化“添砖加瓦”。他们共同组成了“读者金字塔”的稳固根基,这不仅体现在读者间影响关系上的环环相扣,更体现在诗篇一旦在大众间家传户诵,其经典性则很难再动摇。

读者对于文学经典的发现,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乏其例。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其《阅读史》中指出莫理斯·海涅对德·萨德尘封了150多年作品的发现和拯救,凯恩斯爵士和弗莱使被漠视了两个世纪的威廉·布莱克的作品成为每一个学院的必修课程。^⑨就中国文学作品而言,除上述四首唐诗外,还有约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一部诗歌总集,经过孔子的加工整理而成“诗三百”,又经汉儒的阐释而成为神圣的经典——《诗经》。又如杜甫,因其出身与仕宦均不够显贵,缺少足够的读者,杜诗的价值在唐代处于被严重遮蔽的状态^⑩,杜甫在当时也是一位被边缘化的诗人^⑪。至宋代,经过王安石、苏轼,尤其是“江西诗派”这一读者群的倡导,杜甫一跃而为“诗家宗祖”,尊杜成为整个诗坛的共识。又经明代读者的努力,“诗圣”才成为杜甫的专属。

“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⑫在这一累积过程中,如果将经典文本本身视为经典的“原生层”,那么经典在传播过程中,历代读者对其所作的整理与注释、评点与批评则可称为“次生层”^⑬,一如殷璠、高仲武、张说、欧阳修、王珪等人所作的工作。对后世读者而言,“次生层”往往又成为文学经典的一部分与经典一同流传。这四首唐诗与《春江花月夜》一样,因读者的不断发现与推崇,拥有了更多的“次生层”、更高的“附加值”,其创作者亦由此而“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注释

- ①王闳运:《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第2108页。②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③王兆鹏等:《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2011年。④[德]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页。⑤⑨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第502、257页。⑥⑧⑩查屏球:《名家选本的初始化效应——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在宋代的流传与接受》,《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⑦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43页。⑪

杨士弘编选,张震辑注,顾麟评点,陶文鹏、魏祖钦整理点校:《唐音评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⑩高棅:《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81页。⑪王尧衢注,单小青、詹福瑞点校:《唐诗合解笺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凡例。⑫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88年,序。⑬潘伟利:《中日“海上丝路”与唐诗东传》,《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⑭胡震亨:《唐音癸签》,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70页。⑮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⑯卢燕新:《殷璠〈河岳英灵集〉选评常建诗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⑰詹福瑞:《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经典化》,《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⑱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第269页。⑲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7—68页。⑳计有功撰,王仲辅校笺:《唐诗纪事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第834页。㉑⑳㉒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171、171、329页。㉓陆游:《老学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第130页。㉔㉕高建新、李树新:《一首诗创造世界——张继〈枫桥夜泊〉的接受与传播》,《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本文突出高仲武、欧阳修等读者影响之大,同时综合其他诗篇总结“孤篇”经典化的一些规律。㉖查清华:《胡应麟唐诗体格之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6期。㉗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5页。㉘查清华:《明代格调论唐诗学向神韵论演化的轨迹》,《文学与文化》2019年第3期。㉙戴伟华:《王湾〈次北固山下〉诗学史意义的确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廖德明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0页。㉛关于崔颢《黄鹤楼》与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二诗之间的关系,以及“李白搁笔”的真实性,目前尚未形成定论。笔者重在强调话题本身的存在,而非话题内容的虚实。㉜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1065页。㉝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111页。㉞惠洪:《冷斋夜话》,中华书局,1985年,第16页。㉟常建著,王锡九校注:

《常建诗歌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第210—230页。㊱[法]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吴泓缈、张璐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0页。㊲韦应物著,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㊳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中华书局,2002年,第340页。㊴㊵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5328、7487页。㊶凌郁之:《寒山寺古史新榷》,《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㊷㊸杨明:《汉唐文学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64—272、266页。㊹㊺㊻叶昌炽:《寒山寺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8、30、8页。㊼卢熊:《苏州府志》,成文出版社影印明洪武十二年钞本,1982年,第1743页。㊽㊾㊿朱长文撰,金菊林校点:《吴郡图经续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36、40页。㊿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40页。㊿方守彝、姚永樸、姚永樸:《晚清桐城三家诗》,黄山书社,2013年,第82页。㊿陈衍:《石遗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86页。㊿陈文忠:《从“影响的焦虑”到“批评的焦虑”——〈黄鹤楼〉〈凤凰台〉接受史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㊿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085页。㊿王思任著,李鸣注评:《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66页。㊿殷企平:《普通读者》,《外国文学》2019年第6期。㊿俞陛云:《诗境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224页。㊿郁玉英、王兆鹏:《宋词第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经典化探析》,《齐鲁学刊》2009年第6期。㊿[加]阿尔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5页。㊿丁放:《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文史哲》2018年第3期。㊿戴伟华:《杜甫:一个被边缘化的当代诗人》,《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㊿[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㊿詹福瑞:《试论中国文学经典的累积性特征》,《文学遗产》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采薇

Readers and the Canonization of the Four Tang "Single Poems"

Pan Weili

Abstract: Many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who were talented but in low official position, can always be regarded as masters by virtue of an excellent work, such as Wang Wan, Cui Hao, Chang Jian and Zhang Ji. Due to the discovery and admiration of readers in previous dynasties, they stood out among many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by virtue of one of their own poems, namely *Passing by the Northern Mountains*, *the Yellow Crane Tower*, *Monks' Abode in Poshan Temple* and *Night Mooring at Maple Bridge*. There were three types of readers who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canonization: the first was those who discovered the artistic charm and unique value of these works, and recommended them to contemporary readers, which greatly affected the collection of later generations' anthologies; The second type was the celebrities who strongly recommended or gave endless values to these works, whose admiration made these poems get more attention; The Third was the elites who carved poems in the actual places and countless people led by them. There were many poems carved in Beigu Mountain in Zhenjiang, Yellow Crane Tower in Wuhan, Poshan Temple in Changshu and Hanshan Temple in Suzhou, besides, there were many scenic spots named after poems. When readers recite one poem over and over again in these scenic spots, they will reconfirm and strengthen the canonization of these poems. Every reader's approval contributes to the canonization of the poem.

Key words: Tang poetry; readers; canonization of literature; reading history of Tang poetry